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

田桓◎著

田桓日本研究文选

TIAN HUAN RIBEN YAN JIU WEN XU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

田桓◎著

田桓日本研究文选

TIAN HUAN RIBEN YAN JIU WEN XU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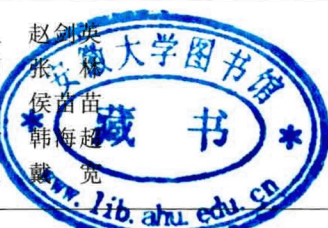
田桓日本研究文选 / 田桓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 - 7 - 5161 - 3794 - 9

I. ①田… II. ①田… III. ①日本—研究—文集
IV. ①K313.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0227 号

出版人 赵剑秋
选题策划 张 楠
责任编辑 侯苗苗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503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出版个人“文选”，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运，我认为这是文化名人、大学者的事，像我这样的一个研究员，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一般学者，因此，我首先应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和老干部局领导对我的大力支持，也要感谢老朋友刘颖同志。刘颖同志的建议鼓起了我出版个人“文选”的勇气。我还要特别感谢日本所党委书记高洪同志和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的鼎力推荐，才使出版资助申请获得成功。

1964年夏天，我从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组织上根据需要，分配我到辽宁省日本研究所工作，又于197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直到2005年从日本桐荫横滨大学退休，其间41年中，我主要从事日本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工作。在这40余年中，前7年因“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未能从事日本研究，最后6年在日本私立大学从事高等教育工作，附带做些日本研究工作。

在这40余年的工作中，实际真正纯粹从事日本研究大约28年，在这28年日本研究工作中，总共公开发表科研成果包括：独著科研成果一部，37万字，即代表作《日本战后体制改革》，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主编一套4卷本《战后中日关系史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包括第1卷《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第2卷《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3卷《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4卷《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

在这些年的日本研究和教育工作中，我独自或与同行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与人民出版社等，共出版独著、合著、合编、独译、合译、监译等日本研究图书22部；在国内外中、日文报纸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给日本大学生授课6年。

参与同行合作研究、合著、专著6部，其中有：一，《战后日本经济危机简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二，《日本政治概况》，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所何倩（赫赤）等5人合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三，《日本经济的活力》，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课题组4人合著，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四，《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的比较》，叶坦主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五，《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课题组汤重南等6人合著，由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六，《战后中日关系史》，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蒋立峰等合著，田桓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书3部：一，《日本经济的发展》，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二，《留日归来忆扶桑》，田桓、唐景芸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三，《中日文化交流事典》，刘德有主编，田桓参与副主编，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独译两部：一，《日本的基金会》；二，《战后日本政治舞台内幕》。这两本都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监译两部：一，《消费生活论》，日文原著铃木深雪；二，《申通投标实例及防止对策》，日文原著铃木满。以上两部书均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与同行合译书3部：一，《东条英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二，《二十一世纪的日本和世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三，《冈崎嘉平太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另外在中、日文报纸杂志上，发表30余篇论文。

本“文选”是从我的日本研究专著《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一书15章中选出的相对独立的11章内容作为独立篇章，另从《日本的经济活力》《文明的运势》《战后中日关系史》等3部合著的著作中选出5篇文章，从30余篇报刊杂志文章中选出6篇，共计22篇文章所组成的。“文选”全书由日本历史篇、日本政法篇、日本经济篇、日本社会文化篇和中日关系篇五个篇目组成。

在我的这些日本研究成果中，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代表作——《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一书作为突出贡献代表成果，参加了1993年11月由中国留日学人活动站发起和组织的首届中国留日归国人员科技成果赴日展出。展览成果从我国改革开放始到1993年为止。组织者从8000余名留日归国学员

中选出 40 名在各条战线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参加优秀成果赴日展出。我的研究成果——《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一书被选入其中，为此，《人民日报》驻东京记者张国成于 1993 年 11 月 9 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首届中国留日归国人员科技成果展览会，在东京开幕。”“展览会通过图片和文字介绍了 40 位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所取得的成就。田桓，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1981 年至 1983 年作为教育部派遣的留学生，在东京大学法学部留学，回国后他根据我国的国情和自己的专业，先后写出了《日本战后体制改革》《战后日本公务员制度的形成》等许多著作，为我国的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我没想到我的一部研究成果能够成为 8000 余名留日学人中 40 名当选的优秀成果之一，更没想到会受到《人民日报》如此高度的评价。当然，为了这部著作，我也付出了许多个不眠之夜。

《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一书于 1990 年 3 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中日双方学者的较好评价。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俞辛焞教授在回答出版社和作者对该书征询意见时说：“《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一书是田桓同志积多年之力所写的一部专著，填补了我国在战后日本史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是一部有深度的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该书……结构和体例严谨，内容浩博精深，思路清晰，论述精当公允，笔墨流畅，显示了该同志把握重大历史事件的史学修养和能力。”“该书是国内外少有的一部日本史专著，值得推崇的佳作。可作为大学日本史研究生教材。”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在征询意见时评论说：“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研究日本战后体制改革的学者逐年增多，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其中，有影响者当首推田桓先生。”“该书是一部颇有特色的专著。作者对日本战后体制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系统见解，指出日本战后体制改革‘是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社会变革’，‘是不亚于明治维新的一次社会大变革，其动力来自内外两个方面，是内外两股力量合流的结果’，‘国内人民群众和中产阶级是变革的基本动力’，等等，是符合历史真实的真知灼见。总之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它代表和反映了我国对日本战后改革研究的最新成果，相信读者会从这部著作获得教益，得到启示。”

东京大学法学部长石井紫郎教授评价该书说：这部著作“对改革的原委和历史性意义尤其是关于对其后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显示出连日本学者也不容易达到的水平。”石井教授还说：“作者田氏具有对学问充满诚实和真挚的人格以及出色的历史感觉，敏锐的分析力，才使

大作得以诞生。”

此外，南开大学王振锁教授、世界历史所管宁研究员和《人民日报》群工部部长李有存等同志就《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一书的出版，分别在《日本学刊》、《世界历史》和《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评论文章。

《人民日报》海外版于1991年3月6日“社科书讯”栏报道说，对田桓著《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一书，“日本学者认为，作者的这一研究，抓住了日本现代史的一个核心课题”。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8月23日以《我国第一部日本战后史研究专著》为题发表书评说该书特点：1.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2. “层次分明，图文并茂”；3. “立论清新，论据充分”；4. “结论明确，评价得当”。该书作者认为“战后体制改革是在日本战后特定历史条件下由明治维新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和完成”。

除上述对我的研究成果评论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有些评论也可部分反映出我的研究价值。1992年3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简报》中说：“我社出版的两本书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江泽民总书记为访日作准备，需要阅读我社出版的《日本政治概况》一书，该书由“我院何倩、田桓等同志著，39.4万字”。1992年3月16日本院办公厅《工作日报》发了同样报道。

通过上述材料，我只想说明，几十年来，根据党和国家的指示和要求，我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尽了最大努力，由于个人的能力有限，有的地方做得还不好。有的客观评价过高。即使如此，我也会正确对待，今后我会把那些较高的评价当做奋斗目标，去努力做到。努力争取使自己成为一个更有社会价值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本书中凡原载《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一书诸篇文章中所引用的图表，皆转引自日本自由国民社出版的日文书《口语宪法》（自由国民·口语法全书1）一书中所用的图表。

期望本“文选”的出版能给社会带来有用的价值。由于本人学术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田 桓

2011年10月10日

目 录

前言	(1)
----------	-----

自序:我的日本研究拓荒之路	(1)
---------------------	-----

第一部分 日本历史篇

日本的琐国与开国	(17)
岩倉使節団と日本近代化	(23)
日本近代化的经验与教训	(30)

第二部分 日本政、法篇

日本战后宪法的修改与国体变迁	
——从战前天皇极权制到战后现代民主制	(41)
改革议会制,重建日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从协助立法机关到最高权力机关	(69)
恢复自由民权,重建战后日本的政党政治	
——从翼赞政治到政党政治	(88)
国家行政机构改革,从政治压迫转向经济建设	
——内务省的解体与经济官厅的壮大	(109)
战后日本公务员制度的形成	
——从战前天皇的官吏到战后国民的公务员	(129)

战后日本司法机构的改组与司法独立

- 司法制度改革,免除行政对司法干涉 (144)

第三部分 日本经济篇

改革全日本的农业土地制度

- 从寄生地主制到自耕农制 (167)

解散财阀,实施垄断禁止法

- 从家族财阀到垄断企业集团 (198)

战后初期日本劳动体制改革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242)

日本战后改革给日本经济带来活力

- 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发展 (249)

略论日商对华直接投资 (273)

第四部分 日本社会文化篇

战后日本的教育体制改革,废除军国主义教育

- 教育的现代化与大众化 (281)

战后日本旧家族制度的解体

- 民法的修改与旧家族制度的变迁 (307)

东亚文化的原生与转型

- 中日儒学与社会发展 (329)

日本战后体制改革的评价及其局限性 (349)

第五部分 中日关系篇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绪论

- 研究战后中日关系史的目的、意义及历史发展过程 (367)

揭开中日关系的新篇章——中日邦交正常化(1971.10—1972.9) (383)

中日复交后的友好交流

——纪念中日复交 20 周年 (431)

略论中日关系的过去和未来

——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 (439)

附录:田桓履历书 (446)

自序：我的日本研究拓荒之路

2011年4月12日，我有幸应邀参加了由北大、南开和复旦三大学日本史研究者联合举办的“新中国日本史研究拓荒者学术会议”。这对我来说，本来是渴望已久的事，老同行难得的聚会，无奈身患重度眼疾，视力模糊不清，难以完成参会文章，但又舍不得丢掉这与各位师兄弟重逢的好机会，于是带着白卷参加了会议。在会议的热烈讨论中，我深深受感动。会议主持者强调要出一本“文集”作为会议的纪念，我在这一强有力的号召鼓舞下决心克服老眼昏花的困难，手里握住放大镜，说什么也要把这篇纪念文章写出来，以报答会议主持者的热情关怀。

我出身于农家，七代前的祖辈从山东黄县逃荒闯关东来到了辽东半岛渤海岸边，母亲是纯文盲，父亲未念过书，略识一些字。儿童时期，由于家乡国共内战，小学最多读过3年书，中学阶段只读过初一，初二以后即转入农业中专读书。就在这个时期，母亲突患重病，农村缺医少药，不久母亲病故，这对我来说，如同晴天霹雳，在母亲病故的刺激下，我产生了考医大，要当医生的念头。1956年我尝试了考医大，结果因未学初、高中的数理化而名落孙山，事实告诉我，未来我没有当医生的条件，但我没放弃升学的念头，只好另找别的出路。1959年我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辽宁大学历史系。1964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辽宁省日本研究所工作。从1964年毕业到1971年前后七年时间被“四清”、“文革”和“干校”占用了，既未研究日本史，也未学日文，1971年回城工作时已经是35岁的中年人了。十年浩劫白白浪费了七年的青春时光。

下面我把自己的拓荒之路分成五个阶段进行阐述：

第一阶段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阶段 白手起家,闯进科研之门 (1971—1978年)

本来我上大学的时间就晚,大学毕业后,又浪费了七年的时间,到了35岁才开始接触研究工作。既不懂专业,又不懂日语,纯粹是门外汉,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不过这也是好事。形势逼着我,必须急起直追,加倍努力,否则无法在这里工作。工作一开始,要学日语,又要学专业(包括日本史和日本现状),还要看中文资料,也要写文章,整天忙得晕头转向。1972年春,新成立的辽大日本所决定出版所内刊物,领导又决定让我参与编辑工作,强调在编辑工作中,提高研究水平。这在当时的“文革”后期是全国第一家出日本研究的杂志。1972年5月《日本问题》创刊号出版。辽大日本所初创时,人数极少,我不但要编杂志而且必须写文章。1973年5月同所留苏副博士金明善同志邀我与他合写《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因素和存在的问题》,这篇文章写好后上报给中联部作为内部参考资料。这是我进入日本研究领域的开篇入门文章,是在不懂日文的情况下写的论文。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我深感不懂日文是无法研究日本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向所领导强烈要求给点专门学日语的时间。经领导批准,我于1975年夏到1976年夏,赴大连外国语学院进修一年日语,这一年的进修,我的日语水平有所提高,在此前提下,后来我参加了辽大日本所集体摘译的《日本经济的发展》一书的出版。从1971年进入辽大日本所到1979年离开辽大日本所的第一阶段的八年中,我还发表了如下一些成果:

与本所平献明合写《战后日本经济危机简史》,197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与本所邱生合写《日本国家机构概况》,1978年5月作为辽大外语系日语专业的教材(专题讲座)。

与全所合编译《日本经济的发展》,我承担石油工业部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辽大日本所,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为日本研究打下了相对稳固的基础,由于自己加倍的努力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这八年当中,1973年7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经过14年的追求而获得的

政治生命。

第二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日本研究所阶段从地方到中央；从国内到国外扩大研究视野（1979—1986年）

在上一阶段八年工作中，我有两个体会，一个是在地方搞外国问题研究，有诸多不便，能在首都北京搞就好了，于是我开始注意寻找到北京工作的机会。1978年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重大转折时期，从此中国社会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共党内的极“左”路线受到了彻底的批判，整个国家和社会进入相对和平稳定时期，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走上正规。1978年年中当我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成立的世界政治研究所需要研究人员时，我就毫不迟疑地向该所领导同志毛遂自荐，要求到该所工作。该所领导和人事部门对我在辽大日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审查，认为我符合该所的要求，决定同意调进世政所工作，为此世政所人事干部王戈同志特意到沈阳辽宁省革委会审查了我的档案，同时也审查了妻子唐景芸的档案，经档案审查无问题后，世政所向院领导和院政治部申报了调我进京工作的请求。为了解决我的家属三人（妻子和两个儿子）随我一同进京户口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部又特意向民政部打报告，申请调我全家的四人户口，随后社科院政治部又向辽宁省革委会政工组发送商调我到社科院工作的商调函。虽然辽宁省革委会同意我的调动，但辽大党委认为辽大日本所初创也缺研究骨干因此表示不能放人。于是社科院先借调我到世政所工作。我的人事关系在辽大搁浅了八个月后才转到北京。一直到1980年夏天，我全家四口人才在北京落户。

我到中国社科院世政所后不久，正好赶上院长胡乔木同志要求世政所提供美、英、法、德、日五国政府官吏制度的相关资料，所以我到世政所第一项工作任务是撰写《日本现行官吏制度简介》，文章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简报》第78期（1979年9月22日），报送党中央领导同志参考。这是我到中国社科院世政所后，参加的一项关系到国家官吏制度改革的重要研究工作。其后世政所日本组的五位同志，就在商量全组参与《日本政治概况》一书的编写工作。1980年2月和10月，世政所分别邀请了东京大学社科研究所所长石田雄教授就日本近代化问题、东京大学菊地昌典副教授就苏联问题分别

在所内作了学术讲演。我对二位学者讲演内容分别作记录整理成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世政所刊出的《世界政治研究资料》上。从这里我也体会到地方大学与中国社科院相比，对外交流的层次和水平有一定差距。

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壮大起来。到1981年5月，原来的世政所因研究工作需要按国别与地域分别成立了美国所、日本所、西欧所，另外还有些人根据原有的专业分别拼入世经所，改称世经政所。另有一部分人拼入了苏联东欧所。就这样我由1981年5月转到日本所工作。

另一个体会是，研究外国问题，更应该到被研究的对象国去体验实践，防止“隔靴搔痒”脱离实际。其实我这个出国留学深造的想法本来应该是正常的，合情合理的，但在十年浩劫的岁月里，谈到这个问题，也只能是白日做梦，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80年不但不是梦，而成为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因为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后，教育战线很快开始拨乱反正，在全国开始恢复高考。随后中央也发现经过十年动乱的中国，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1980年中央决定向发达国家选派留学生。据说这时期教育部给中国社科院90个出国名额，志愿报名的人数只有60多人，经过外语选考，60人当中只剩下40人左右符合条件。在社科院世政所内能选出符合条件的也只有我们5人。不久我们5人就分别派到英、美、法、德、日等5个国家，各在自己研究的对象国留学了两年，这对我来说，也是“天赐良机”，让我在45岁时，到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进修留学两年。自从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日本所时，我就有了赴日留学的夙愿，没想到大学毕业16年后，终于圆了我的留学梦。

出国之前，教育部规定必须进行外语全国统考和政治培训，这两个步骤完成后，1981年9月24日我与同一批赴日留学生离开祖国，来到日本列岛，开始为期两年的海外生活。

当天下午我们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负责安排我们留学生生活的教育处的同志告诉我：“你的留学地址和指导教师都有变动。”经他说明我才知道，原定我的导师是东京大学社科研究所的石田雄教授，在我来日前夕，石田雄教授应邀赴德国讲学一年，在我的指导教授出现空缺的情况下，东大法学部坂本义和教授自告奋勇，愿意替石田教授指导我这个老留学生（45周岁）。抵日三天后，我到东大法学部坂本研究室报道，坂本教授听了我的寒

暄之后，就和蔼地对我说：听了你的日语，感到有些不自如，但你不用担心，我替你请了一位日语先生，教你一段，你也就会说了。头一次见导师本来就担心日语说不好，心里忐忑不安，听他这么亲切的安排，心里轻松多了。原来坂本教授找的日语老师，是他研究室隔壁的村上教授的夫人村上真澄老师，她在东大教育学部念书时，就学会多种语言（包括梵文），她在高中教过英语课后，辞职回家生孩子，其间又学会了中文。听村上教授说，他夫人从台湾人那里学了中文之后，还想从我这里学点“大陆中文”，所以对教我日文这件事很积极。在村上老师的指教下，我的日语进步很快，第二年我就开始用日语写论文了。

通过村上老师对我一对一的日语教学，我与村上教授来往自然多了。在法学部内，四位年龄与我相仿的教授组成的小团体，其中为首的是村上教授（专攻德国法，1933年生，曾获德国国家一级骑士勋章），其次是石井紫郎教授（专攻日本法制史，1935年生，曾任东大首任副学长，东大退休后曾任“日文研”常务副所长），第三位是三谷太一郎教授〔专攻日本政治外交史，曾获日本国家文化功劳赏，现任平成天皇的相谈役（顾问），1936年9月29日生，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第四位是青山善充教授（专攻民事诉讼法，曾任东大副学长，现任日本法制审议会会长），前三位现在都是日本学士院终身院士。这几位虽然年龄与我相仿，但他们资历却比我老得多。我刚到日本留学时，国内职称是助理研究员、讲师，而这时他们都有10年以上的教授资历了，他们虽然都没有博士学位，但他们带出的博士却是成群结队。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谦虚谨慎的品格。

东京大学是日本的最高学府，东大法学部也可以说是日本政治家和企业总裁的摇篮，我作为中国的农民子弟能够进入日本最有名的大学最令人羡慕的法学部留学，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派到东大法学部的第一名留学生。出现这种情况不是我天资聪明，能力出众，而是党和国家把这个意外的好机会给了我这个农家子弟。如果让我参加正规考试，我做梦也不会考上这所东洋名门大学。所以我要诚心诚意地，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栽培。

在第二阶段中除上述研究活动外尚有如下活动：

1984年8月由何倩（笔名赫赤）等集体撰写的《日本政治概况》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以耕夫的笔名参与了该书的撰写工作。

1983年1月在《日本展望》1月号上发表了《日本近代化的经验和教训》；1983年11月在东京大学出版会的《U·P》11月号月刊上发表了《岩

仓使节团与日本近代化》(日文),该两文都是为纪念留学而写的文章。

1985年7月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发表了《丰田公司的成功之路》。1985年12月在《历史研究》双月刊上发表了《战后日本公务员制度的形成》。

1985年8月—1997年10月当选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

1995年6月—1998年1月当选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

第三阶段 世历所阶段集中精力写好一本书, 为科研打下好基础(1986—1990年)

在我从日本所向世历所调动的过程中,之所以能顺利成功,其原因有二:据相关人士谈一是刚退休的世历所老专家万峰同志提供了热心推荐;二是来世历所前夕,我在中国社科院出版的《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战后日本公务员制度的形成》。这篇在当时具有突出现实意义的文章,也是推动我调动成功的有利条件。

前面说过,我留学回国后,计划写一部有关日本战后改革的著作,在日本所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这个愿望。来到世历所后,终于有了实现这个愿望的条件。从1986年到1989年,我大约用了3年的时间,终于撰写成了《日本战后体制改革》37万字的书稿,这部书稿完成后交给经济科学出版社,很快于1990年3月获得出版。这部书稿的撰写不但获得本所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日本也获得意想不到的支持与协助。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日本的日中民间友好人士更加活跃。特别是1981年中国开始大批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以后,日中民间组织援助中国留学生的活动也日益增多。1987年原东大经济学部长,退休后改任东京女子大学学长的著名日中友好学者隅谷三喜男先生特意成立了东方学术交流协会,动员日中友好人士捐款,援助中国赴日留学生。当隅谷先生知道我要研究日本战后改革这个课题时,他让协会事务局长李廷江告诉我:如果我打算来东大法学部客座研究,从1988年1月开始,协会将每月向我提供10万日元奖学金,说这是协会发放的第一份奖学金,让我尽快提交申请书。隅谷先生为了帮助我完成研究任务,还不辞辛劳,把自家藏的六卷本一套资料《战后20年史》赠送给我使用。我正是在这些日中友好人士满腔热忱的支持下,顺利地完成了在东大一年的研究,顺

利地完成了《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一书大部分书稿撰写任务。

1988年7月,在世历所我晋升为副研究员。

1983年9月,我赴日留学期满归国,仍回到日本所从事研究工作,刚回到所里,所长让我写一些留日观感,我在他这句话的启发下,还动员其他留日学人都来写留学观感,后来大家共写出46篇回忆文章,凑成了一本文集,取名《留日归来忆扶桑》。其中不但有新留学生,还有战时的老留学生孙平化先生和肖向前先生等,文章内容多半是回忆日中师生间和留学生与房东、朋友之间的友好故事。1992年5月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日本友人津山直一教授和根本安雄先生都慷慨解囊,给了出版社一些补贴。我和妻子唐景芸共同主编了这本书,也算是为中日友好事业做了一件小事。

1984年年末,日本所领导让我筹办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的学术刊物,说我在辽大日本所办过杂志,有经验。当时我根据院长马洪和院秘书长孙尚清的指示,给文化部打报告,申请在日本所建立杂志社,申请出版日本所的学术刊物。报告中注明期刊为双月刊,暂用名《日本问题》(后改名为《日本学刊》)。报告中提出拟成立15人左右的编辑部,主编为所长何方,副主编戴有振,编辑部主任田桓。1985年年初,发行了创刊号。该刊经我手出刊四期后,我被调到经济研究室任副主任。

1985年,冯昭奎要求我与他一起申请丰田基金会的研究资助,并让我出题目,我提了《日本经济的活力》,就以这个题目向丰田财团提出研究资助申请,不久丰田财团同意资助,并说暂付资助额,后尚有追加资助额。原有两人的课题组,后根据所长的意见改成四人课题组。丰田财团还邀课题组成员赴日考察,参观了位于爱知县的丰田汽车总公司。这是丰田财团资助中国科研的第一个项目。该课题组赴日考察后,分头撰写研究报告,总体报告完成后,书稿交给航空工业出版社,《日本经济的活力》于1988年2月出版发行。

1986年4月,我离开日本所前,抽空搞了一些翻译成果。1987年5月独自翻译出版了《日本的基金会》。1989年5月独自翻译出版了《日本政治舞台内幕》。1987年9月与唐家璇、周斌等共同翻译出版了《21世纪的日本与世界》。1987年8月与刘敬文、李廷江等合译出版了《东条英机——日本陆军兴亡史》等。